

YILIN
XUELUN
CONGSHU

王守仁 主编
姚君伟 副主编

终结与起点

——新世纪外国文学研究



线结与起点

——解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YILIN
XUELUN
CONGSHU

王守仁 主编
姚君伟 副主编

终结与起点

—— 新世纪外国文学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结与起点——新世纪外国文学研究 / 王守仁主编.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12

(译林学论丛书)

ISBN 7-80657-477-8

I . 终... II . 王... III . 文学研究 - 外国 - 文集 IV . I1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9189 号

书 名 终结与起点——新世纪外国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冯一兵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插 页 2
字 数 267 千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477-8/I·368
定 价 18.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1988年12月,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成立,标志着江苏省外国文学教学、研究、翻译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江苏是文化大省,外国文学工作具有优良的传统和厚实的基础。江苏在外国文学作家作品、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批评、外国文学翻译、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以及外国文学出版等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通过每年举行年会等活动,开展学术交流,推进了江苏省外国文学工作的发展和繁荣。

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演进有密切关系,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我国对外国文学翻译引进的历史已长达一个半世纪。早在1853年,英国作家班扬的《天路历程》就被译成中文,成为第一部外国长篇小说译作。1864年,美国诗人朗费罗的《人生颂》有了汉译本,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首汉译外国诗。^① 第一篇外国短篇小说译作是美国作家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中文题为“一睡七十年”,刊于1872年4月22日《申报》。^②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了译介外国文学的一个高潮,为当时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文化上的阐释和反传统的话语。五四时期外国文学中那些张扬个性、具有反叛精神的浪漫主义作品十分流行。在二十世纪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①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4、79页。

^② 孙致礼:《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内,揭露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黑暗、描述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受到推崇。八十年代以来,早先被视为“颓废”、“腐朽”的现代主义作品,重新得到肯定。外国文学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三个流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十世纪上半叶,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外国文学研究也随之应运而生。“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始终与外国文学翻译紧密相连。这是我国外国文学工作的传统和特点。”^① 早期的研究主要以评述作家作品、为译作撰写“小序”、“跋”、“附记”的形式出现。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等人写过不少外国文学的评介文章以及翻译作品的前言和后记。与此同时,大学里将外国文学列为正式课程。1921年吴宓从哈佛大学学成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英语系、西洋文学系讲授英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等外国文学课程,并编辑《学衡》杂志。1931年范存忠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中央大学外国语文学系任教。老一辈学者筚路蓝缕,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开始起步。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外国文学工作者努力建立一种“批判模式”^②,大力提倡“人民性”、“阶级性”等社会学观念在文学领域的应用。由于片面强调所谓的思想内容,对资产阶级作家进行“批判”和“阶级分析”成为当时外国文学研究文章的一个特征。1976年“四人帮”覆灭,宣告“文革”十年动乱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人们的思想获得解放。外国文学研究摈弃了简单的“批判模式”,开始大力引进西方的文学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

^① 吴元迈:《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 50 年》,《外国文学研究》,2000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② 周小仪:《英国文学在中国的介绍、研究及影响》,《译林》,2002 年第 4 期,第 191 页。

方式，并取得许多成果。吴元迈在《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 50 年》报告中认为：新时期的二十年“是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最兴旺发达的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所无法比拟的”。^①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对存在的问题也应有清醒的认识。总体而言，二十世纪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还处于草创和准备的基础阶段，大量的工作是翻译介绍外国作家作品。普遍性的外国文学翻译介绍作为一项基本工作，适应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生活和了解世界的需要，其意义和作用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畅达。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外国文学研究需要与时俱进，向前发展。

在过去特定的年代，文学的工具性社会功能一度过于强大，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了解人生、批评社会的一个主要渠道，而阅读文学则是文化消费的主导方式。近年来，文学回归到它应有的位置，并且受到来自电影、电视、网络、流行音乐的挑战。当代社会的文化消费模式已发生巨大变化，人们在紧张工作之余，往往不是选择读文学作品，而是看电视、上网，而新闻媒体对社会的监督也越来越完善，干预生活已不再是文学家的首要任务。文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下降，直接影响到外国文学。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外国文学不再是了解外部世界的惟一窗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刚刚摆脱“文革”封闭状态的人们争相阅读外国小说的那种动人景象已经成为历史记忆。外国文学失去了人们的兴趣和关注。尘埃落定，热情消退之后，外国文学研究的边缘地位日渐凸显出来。

在中国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力量来自高校外文系和中文

^① 吴元迈：《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 50 年》，第 11 页。

系的教师。他们研究的特点是在阅读原著或译著的基础上,对文本意义进行阐释评述,大都是用中文来写文章。这里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偏重介绍外国文学,没有能够真正开展学术研究,与国外学界缺乏对话;二是评论文章限于外国文学圈子,与中国文学、中国的主流学术界缺乏联系,引不起人们的关注。许多人写文章,与其说是要推进学术的发展,不如说是为个人实际利益(如晋升职称)所驱动。实事求是地讲,外国文学研究学术水准较低,存在与中外学术界两头脱轨的现象,有相当一部分著述是同水平重复。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如何获得生机和活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个人以为活力来自学术的创新。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指出:“学术是一种创造活动,它的精髓就在于创新,没有创新,学术就停止了,也就失去了生命。不创新的学术是静止的学术,没有创造力,这样的学术充其量只能是重复制造,是‘再制’和‘仿制’。”^① 学术创新首先要有学术的积累。创新必须以熟悉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方能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否则很可能是重复别人,或者还达不到别人的水平。第二是要了解学术研究前沿动态。孤陋寡闻,没有掌握国内外最新的资讯,研究工作很难真正有新意。第三是要有洞察力,能在平常之处见出不平常,在看似互不相干的现象中发现内在联系,寻幽探微,分析综合,成一家之说。

近年来不少人对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出现的所谓“失语症”深表忧虑,试图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话语,重新构建中国批评话语体系,以便参与世界文化对话。这种想法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民族主义的感情多于客观冷静的思考。其实,与现代化进程相关

^① 钱乘旦:《创新与求实是学风之本》,《社科动态》,第24期(2002年8月20日)。

的概念,包括科学技术、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观点等等,都是从西方引入的。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我们一直在采用悲剧、喜剧、主题、情节等西方文论的术语来分析阐释文学作品。话语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舶来品”。话语不单单是语言,而是“一套概念体系”。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话语,已经确立了统治地位,“这套话语经过数百年积累,汇集了千百万智者对于人类各种问题的深邃思考,确具科学价值”。^① 踢足球要遵守国际足联制定的规则,否则就别想参加“世界杯”。如同中国加入WTO后,要学习世贸组织的规则,在世界文化对话中,现阶段我们也需要学习西方的话语,而不是一厢情愿地去“颠覆”西方话语体系、重新制造一个新的话语体系。不去了解、掌握、运用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后进国家只能使自己边缘化,而本土知识也无法获得全球意义。这个真相也许令人不愉快,却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现实。

因此,在外国文学研究中,我们首先要了解和熟悉西方话语,在此基础上去确立自己的视角。对于西方话语体系,要能走进去,跳出来。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努力追求中国特色和主体意识,但是,主体一定要在与他者关系中确定,要有他者作为参照。我们过去批判英美现代派文学,说它是“垂死阶级的腐朽文学”,称艾略特为“美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这类文章的中国特色不可谓不鲜明,主体意识不可谓不突出,但今天很少有人可以接受其观点。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批判模式”也具有“积极意义”^②,但它毕竟是我们走过的一段弯路。除了“无法应对审美批评的缺点”之外,大多数“批判”文章的一个主要缺陷是无视西方学者研究成果和西方话语的存在,结果成为孤家寡人的闭门造车,自说自话。同国外学界展开平等对话和交锋,需要掌握和运用西方话语这一利器,同时

① 乐黛云:《跨文化之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② 周小仪:《英国文学在中国的介绍、研究及影响》,第192页。

需要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便是学术研究。中国学术的发展必须是在全球化的学术体系中创新。

外国文学曾经对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可以预见,在二十一世纪它将继续发生影响。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我们开展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机会,也提出了挑战。外国文学研究必须在学术上创新,以获得参与当代文化进程的资格。

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于2000年和2001年分别在南通师范学院和徐州师范大学召开“世纪之交看外国文学”和“新世纪中外文学研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展开了比较广泛深入的学术讨论与交流。本书收集的文章是从这两次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中挑选出来的,大致分为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国别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四类,主要议题涉及英、美、法、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小说、诗歌、戏剧、文学批评等,既有较为深入的理论探究,又有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译林出版社的支持。在编选过程中,南京师范大学张杰教授给予了很多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守仁

2002年11月于南京大学

目 录

序.....	王守仁(1)
符号学王国的构建:语言的超越与超越的语言	
——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研究.....	张杰(1)
“被贬抑的艺术”	
——二十世纪形式批评视阈中的短篇小说	王腊宝(13)
女性主义视阈中的格林童话模式	杨莉馨(36)
二十世纪西方女性文学的审美特征	王晓英(49)
《傲慢与偏见》的隐蔽故事:	
——奥斯汀男性中心主义意识批判	武月明(59)
写出一个女性自己的世界	
——曼斯菲尔德与劳伦斯作品比较阅读	刘须明(68)
简论默多克的《在网下》	丁建宁(77)
奈保尔《米格尔大街》的文化诗学内涵	
——兼论中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	蒋岱(83)
再论哈姆莱特并非人文主义者	从丛(93)
试论托马斯·哈代诗歌的艺术成就	董务刚(110)

堕落不堪的现代世界

——评约翰·霍克斯的《食人肉者》 陈 许(124)

用生命铸造的生态经典

——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 韦清琦(133)

美国“新新闻主义”的扛鼎之作

——评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 张素珍(141)

创造“华裔美国感性”

——赵健秀的华裔美国文学评论与创作实践述评

..... 赵文书(151)

复仇·权利·谎言

——评迈克尔·维弗尔的《谎言》 张兰珍 苗秀楼(164)

海明威小说的电影化 张 瓷(172)

奥尼尔的悲剧意识探源 苏 煒(188)

认识的痛苦:西方对佛教的接受 钱林森(200)

米修作品中的道家投影 刘 阳(213)

冷战后时期的文学与“文明的冲突” 唐建清(220)

《风暴眼》的意识流叙述风格 钟 菲(227)

魅力永恒的《圣栎树》

——浅论莱斯·默瑞的创作风格 刘仪华(235)

从《世界丑闻》解析博尔赫斯的“作家”身份 李 倩(244)

异质文化的吸收与变形:

——从《绿山墙的安妮》到《红头发的安妮》看日本的“安妮热”

..... 傅 俊(252)

二叶亭四迷和《浮云》 赵仲明(267)

“大眼”苍蝇所看到的

——试析新感觉派文学的奠基之作《苍蝇》 吕 磊(275)

没开枪的理由

——简析大冈升平的《俘虏记》 汪丽影(283)

- 读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 彭 磊(296)
渡边文学三议..... 冯 羽(308)
数码“十”破译：基督教与西方文学的结构基因 曹祖平(318)
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思想的形成
——兼论卡西尔文化哲学的人类学影响 顾 胜(324)
英语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方法论思考 吴格非(345)

编后记 (353)

符号学王国的构建：语言的超越与超越的语言 ——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研究

张 杰

翻开国际符号学研究的地图，俯视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原苏联文艺符号学发展的版图，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庞大的符号学王国完全可以与西方的符号学帝国相媲美，它是由两根重要的理论支柱构架而成的，这就是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巴赫金（1895—1975）的社会符号学和尤利·米哈依洛维奇·洛特曼（1922—1993）的结构文艺符号学。二十世纪原苏联的这两位著名文艺理论家和符号学家的学术成就早已跨越了原苏联本土的疆界，对西方乃至世界的文艺学界和符号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十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对巴赫金和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分别进行过一些初步的探讨，北京大学的胡壮麟教授曾两次撰文分析了巴赫金的符号学理论构成，东南大学的凌继尧教授、北京大学的孙静云教授等都曾专门论述过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撩开了原苏联符号学王国的神秘面纱。然而，与我国符号学界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研究相比较，特别是对以索绪尔、皮尔士等为代表的符号学体系的研究而言，我们对原苏联的这两位学者的研究又显得十分不足，我们既缺乏对这一符号学王国构成的系统研究，更缺乏对他们之间的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其实，深入探索和比较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

这些理论本身,而且还能够为我们提供研究方法论上的启示。

一、不同的途径:语言学与超语言学

巴赫金的社会符号学与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尽管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造上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征,但是他们都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有着直接的联系。可以说,前者主要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批判,后者则更多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借鉴并把它运用于艺术符号体系的研究。他们都是在索绪尔共时性语言学的基础上来构建自己的符号研究体系的,只不过所走的途径不同。

我们知道,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辩证法特征,是一种“一分为二,强调一点”研究方法。索绪尔把语言学分为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强调内部语言学;又把内部语言学分成共时性语言学与历时性语言学,注重共时性语言学;接着将共时性语言学的研究分为语言与言语两个方面,突出语言研究等等。显然,索绪尔关注的是语言体系的内部关系研究,而相对忽视言语的研究。

巴赫金敏锐地察觉到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这一特点,并对这位瑞士语言学家的理论提出了挑战,从而把自己的语言学对象主要确定在言语上,即不像一般语言学以研究句法、词法等系统性特征为目标,而是研究在社会交往中,具体语境中活生生的对话人的言语特征。巴赫金的这种以研究言语为特征的语言学,走的是超越规则、体系的另一条研究途径,因此也被称为“超语言学”。

在远古时代,当人类语言还处在孩提时代,在原始社会的部落里,在氏族社会的村落中,人们在祭祀和巫术活动中经常要念诵大量的歌谣与咒语。这是一种神秘而古怪的语言,它发自每一个念咒语者的虔诚的心,但几乎没有一个念咒语者能够明确阐释这种

语言的真正涵义。这其实是一种莫名其妙，含糊不清的混沌语言。对于这些念咒或祭祀者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歌谣或魔咒的意义，不是这种模糊“语言”的逻辑，更不是所谓概念和语法，而是抑扬的诵调、跌宕的节奏，饱满的情绪和神秘的氛围，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幻觉、联想和意象。一句话，关键在于“语境”，而不是“逻辑”或“规则”。正是这种“语境”能唤起人们心灵的共鸣，使人感到语言的神力或魅力。

当然，并不是说这种原始的语言就不具备意义和逻辑了，只是这种意义和逻辑已经与原生的情绪融合在一起了，如果从科学的角度去加以分析，它就会丧失自己的独特作用。这可以说是心灵与自然的交融、感性与理性的混杂。语言在这种状态下不知持续发展了多少万年。

随着科学理论的诞生与发展，特别是从亚里斯多德起，“逻辑学”的萌发与形成，人类逐渐掌握了“归纳”、“推理”、“演绎”与“分析”等思维方式，开始一步一步摆脱了原始的混沌，语言也由此渐渐从原始状态中走出。这样，语言符号的研究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以研究“语境”和“言语”为主的话语学研究；一是以研究“规则”和“体系”为主的语言学研究。

面对这两种语言符号研究的途径，洛特曼走的显然是语言学的研究途径，努力从艺术语言符号的整体结构上去把握艺术现象，找到一种结构艺术作品的体系与模式。巴赫金显然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的话语学研究侧重的是，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对话语境以及因此产生的氛围。

如果说洛特曼试图用语言学的体系去框架纷繁复杂的艺术现象，而巴赫金则力图超越语言学的“牢笼”，进行超语言学的话语研究。所谓超语言学就是一门“研究语言和‘文化’或‘语言行为’这

样一些人类活动关系的学科”。^①

洛特曼作为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继承者,沿着语言学研究的道路走下去,从运用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分析文学现象的体系性与结构性,到把这一研究方法推广到去探讨整个文化体系。在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那里,科学性、确定性、系统性是最主要的特征。然而,巴赫金却是作为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批判者,在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的话语分析中,对话性、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则占据着主导的地位。洛特曼的符号学是语言学的符号学,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是运用语言体系研究来构建的;巴赫金的符号学是社会学的符号学,巴赫金的社会符号学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对话探讨来确立的。

也许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古典文艺批评更强调“神韵”、“风骨”和“意境”的缘故,巴赫金的话语批评在中国更受到关注。其实在俄罗斯,洛特曼与巴赫金是并驾齐驱的两位理论家,洛特曼学说的影响并不比巴赫金的逊色。

二、殊途同归:走向社会文化系统

当代俄罗斯著名洛特曼研究专家鲍·费·叶戈罗夫在 1999 年莫斯科新文学观察出版社出版的《尤·米·洛特曼的生平与创作》一书中,专门就巴赫金与洛特曼之间的关系写了一章,揭示了他们在符号学研究中学术观点的异同。^②

尽管洛特曼一直非常尊重巴赫金,但是巴赫金作为年长洛特

^① R. R. K. 哈特曼和 F. C. 斯托克:《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 213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② 鲍·费·叶戈罗夫:《尤·米·洛特曼的生平与创作》,莫斯科:新文学观察出版社,1999。